



张芝和索靖的书法人生

□ 邓慧君

张芝和索靖是汉末魏晋时期草体书写的开拓者，他们将隶书演变成富有书卷气的艺术，不仅丰富了书写的形式，还推广了汉字的应用。



张芝雕像

众所周知，汉文字开始于殷商甲骨文，经先秦金文篆体（大小篆），秦始皇统一六国“书同文、车同轨”后，到西汉时隶书开始成为主要书写形式。至此，汉字经过将近两千年的发展，步入书写简易、形制规整、笔力沉稳的阶段。东汉后期，隶书开始向随意洒脱的个性化方向演变，草书因此产生，草书使汉字书写建构起艺术性的美学享受，很快得到文人雅士、宦宦达人乃至民间书写者的赞赏和喜爱。草书的出

现标志着我国书写形式从刻板规整走向恣意洒脱。

草书的产生与纸的发明相伴而生。公元105年，蔡伦改进造纸术，汉字书写从竹简、布帛转至纸张，可以说纸的发明，推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。

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置郡县后，大量中原和关中移民迁入，促进了河西走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。东汉后期，敦煌已成为偏居一隅的文化边缘，张芝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生于敦煌。

张芝，东汉敦煌郡渊泉县（今甘肃酒泉瓜州县）人，字伯英，我国草书的开创者。张芝出生仕宦之家，其父张奂，《后汉书》有传，历任议郎、安定属国都尉、使匈奴中郎将、武威太守、度辽将军、大司农、护匈奴中郎将、少府、大司农、太常等职。张奂仕宦足迹遍关东、塞上、陇右及河西走廊，在东汉西北防卫中立下汗马功劳。后因牵扯入党锢之争，归隐乡里，直至终老，于汉灵帝光和四年（公元181年）去世，享年78岁。

张芝为张奂长子，自幼勤奋好学，痴迷于书，淡泊仕宦，朝廷曾以有道征，谢绝，由此被世人称为张有道。张芝勤于笔墨，据《晋书·卫恒传》记载：“凡家之衣帛，必书而后练（染）之；临池学书，池水尽墨。”临池习字由此而来。张芝将字字独立、笔画分离的章草，连笔挥毫，改为字字相连，意气承接且变化无穷的今草。其创作的草体书写形式，冠名后世，开启书写的千秋功业。

张芝草书承自章草，传说章草为东汉章帝首倡。汉隶规整工稳，有人随意潦草书写，使得书写速度加快，书写时间缩短。汉章帝甚喜这种书写形式，在汗牛充栋的奏章中提笔御批，速度快，耗时短，此后这种御用潦草之法被纷纷仿效，经书写者的入微补拙，迅速蔓延至民间，并冠以章草的美名。

章草在东汉后期已经普及，经杜度、崔瑗、崔寔效法，章草由潦草到追求草书之美，东汉末，张芝进一步发挥，摆脱了残存的隶书形迹，自成精巧之态，收放自如，美若流云长河，令世人刮目相看。张芝草书的上下字之间，字与字之间，笔势牵连相通，贯通一气，字的整体效果十分有气势。张芝的草书源于章草，又别于章草，被世人称为今草，之后今草便成为一般意义上的草书了。张芝省减了章草的点划波磔（即撇捺），连笔飘逸，运笔优雅飘逸，被后人推崇为“草圣”。

今草使汉字书写进入新阶段，那就是充分展示书写者独具特色的书写风格，用笔随意，挥洒自如，或如飞龙长空搏击，或如游鱼悠然惬意，或如清涧长流，流而飘洒，或如白云萦回崖谷，任于造化，收放之间，体现书写者用笔之神奇和阔达。其要求功力熟练，心气沉稳，充分体现了书法的创造性风格。

后人赞誉张芝不绝，三国书法家韦诞称其为“草圣”，书圣王羲之十分欣赏张芝，认为魏国的钟繇，东汉张芝乃书法大家。后人将张芝和钟繇、王羲之、王献之称为“书中四贤”。

张芝的草书墨迹流传后世的仅有《冠军帖》。《冠军帖》被《淳化阁帖》收存，《淳化阁帖》也称淳化秘阁法帖，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书法帖，出自北宋淳化三年（公元992年），是宋太宗将秘阁所藏历代书法，令学者摹刻在枣木板上，拓印汇帖共十卷。张芝《冠军帖》收录在《淳化阁帖》第五卷中，《淳化阁帖》使得张芝书法真迹得以流传。

张芝也勤于著书，著《笔心论》五篇，可惜早已失传，只在晋朝卫恒的《四体书势》中留下一句话，“匆匆不暇草书”。

张芝的草书影响所及，批及旁人，

也熏染家族后人。张芝姐姐的孙子索靖受其影响，也在草书上颇有建树，自成一派，做居魏晋书法之坛。张芝的弟弟张昶，字文舒，也善草书。

受张芝草书影响，其姐的孙子索靖承草书之脉，临池习字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，位居魏晋书坛。索靖（公元239年—公元303年），甘肃酒泉人。曾官为征西司马，人称“索征西”。索靖出生于仕宦之家，父亲索湛曾为北地太守。索靖自幼便有逸群之才，与乡人范衷、张翹、索珍、索永赴洛阳太学，驰名海内，号称“敦煌五龙”。其他四人早亡，只有索靖精博经史，留名后世。索靖年轻时曾任州别驾，郡举贤良方正，后因精通西域事务，拜骑都尉，出为西域戊己校尉长史。后受举荐，认为其才艺绝人，宜在台阁，不宜远出边塞。晋武帝将其擢为尚书郎。索靖与尚书令卫瓘都以善草书知名，深受武帝宠爱，时人誉为“一台二妙”。后人评价道：“曜得伯英（张芝字）筋，靖得伯英肉”，意思是他们两人各取张芝所长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

索靖平生著述颇丰，撰有《五行三统正论》之作，主要辨理阴阳运气，又撰写《索子》《晋诗》各二十卷，均散佚。索靖撰写的《草书状》存于《晋书》索靖传。索靖曾经为莫高窟仙岩寺题额。索靖流传后世的书法作品有《出师颂》《月仪帖》等，宋代《淳化阁帖》也收集了索靖的墨迹《载妖帖》八行、《七月帖》四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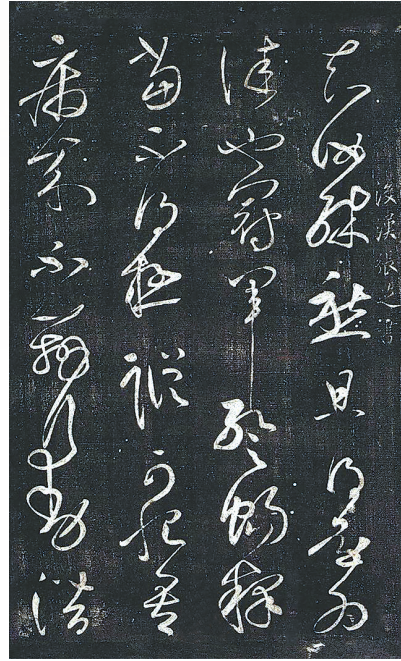
索靖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，唐代书法家欧阳询法度，不轻易赞赏他人，一次，路见索靖书写的碑石后，竟卧于碑下，朝夕摩挲，不忍离去。

索靖的书法，浓淡得度，内涵朴素，古朴如汉隶，转折似今草，气势雄厚，历来被书法家称为上乘。《月仪帖》圆润、古雅、含蓄、浑朴，用笔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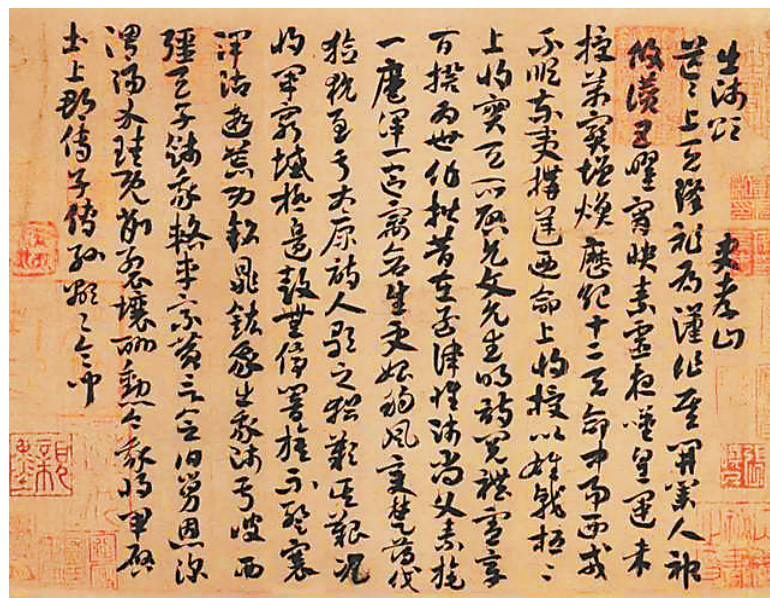
庄，沉稳厚重。南朝梁武帝萧衍赞赏他的字“道劲而峻险。道劲处如飘风忽举，鸢鸟乍飞；峻险处如雪岭孤松，冰河危石”。黄庭坚也称道其书法为“笔短意长，诚不可及”。其草书字体有“银钩冠尾”之称。有人比较索靖与张芝，认为“精熟至极，索不及张芝；妙有余姿，张不及索靖”。两位大师的书法各见所长，都不失精湛完美。唐朝人把索靖的草书列为神品。

索靖《草书状》一篇，对书法的演变、风格、气韵、用笔及章法等作了全面精辟的论述，有些基本观点，至今仍有指导意义。《草书状》一文对草书的产生和形状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，表达了作者对草书的赞赏和厚爱之情。

以张芝、索靖为代表的草书开了我国书法艺术的先河，使书写形式达到美学的欣赏和熏陶境地。



张芝的《冠军帖》(局部)



索靖的《出师颂》

齐家文化中的盘状石器

□ 杜维



齐家文化的盘状石器(作者供图)

但称其为“日月纹”，作为专指比较中性。笔者认为，将此类盘状石器命名为“齐家文化琢日月纹盘状石器”，应该更为准确。

1947年，史前考古学家、古生物学家裴文中（1904年—1982年）先生和同事来到甘肃，在临夏附近调查了张家嘴、崔家庄等遗址。《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》记载，在崔家庄“……所采之论，计最多者为打击之石器，圆形及长方形皆有，并有偏平甚大之砾石，一面凿为半环，他面凿一圆坑者，不知其用途及意义为何。”目前所知，裴文中先生是发现记录齐家文化琢日月纹盘状石器第一人。

据喇家遗址发掘领队叶茂林先生介绍，喇家遗址一个房址中出土了一批“刻符石”，大多在房址周围，摆放得整整齐齐，有大有小。有学者整理研究了73个，认为刻符石器是喇家遗址所出石器中的一类特殊现象，属琢制石器，有圆形、椭圆形、近方形等，有部分残缺，且重量、大小不一。多数长15—20厘米，最大达26厘米，最小约10厘米；厚度在5—7厘米。这类石器上刻画有圆窝形与弧形的图案，形似日月，多数石器的一面为圆形，另一面为弧形；有的两面都为圆形；有的一面有圆形另一面则无图案；个别一面为圆形，另一面为四个圆窝形连成的月牙形弧线。根据符号组合的不同，将其大体分为两类：第一类两面均有符号；第二类单面有符号。刻符石器数量较多，图案重复率也较高，极可能有着某种特殊的用途。

通过出土的众多盘状石器，让我们更加了解到齐家文化，盘状石器是原始石器工具中最早规范定型的石器之一，其分布地域广阔，使用时间较长，分属旧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不同的考古学文化。以玉器、石圆圈、祭坛等为代表的齐家文化，以原始宗教、祭祀礼仪、天文体系、日月崇拜、“昆仑”崇拜、青铜革命等文化内涵，对后代中国商、周及先秦时代以玉通神信仰、礼制文化等华夏文明的成熟璀璨产生了广泛影响。

二十四节气

大雪至 寒冬始

古人云：“大雪，十一月节。大者，盛也，至此而雪盛矣。”大雪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21个节气，冬季的第三个节气。在每年阳历的12月6、7或8日，大雪的意思是天气更冷，降雪的可能性比小雪时更大了，标志着仲冬时节的正式开始。



进入大雪节气后，我国越来越多的地区会迎来降雪，且雪后气温下降，寒冷加剧。每年公历12月7日左右，太阳到达黄经255度时，即为“大雪”节气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：“大雪，十一月节，至此而雪盛也。”古人把这个节气命名为“大雪”，是因为“雪”是寒冷的产物，代表寒雨天气，这节气的特点是气温显著下降，下雨或下雪。“大雪”名称是个比喻，反映的是这个节气期间气候变化，寒流活跃气温下降、降水增多，并不是表示这个节气期间下很大的雪。但是大雪节气之后，天气会越来越冷，下雪的可能性大增。因此，进入“大雪”节气，预示着雪

将由小到大，降雪天数和降雪量比小雪节气增多，特别是在强冷空气前沿、冷暖空气交汇的地区，雪会下得很大，范围也更广。

我国古代将大雪分为三候：“一候鹖鴠不鸣；二候虎始交；三候荔挺出。”是说此时因天气寒冷，寒号鸟也不再鸣叫了；此时是阴气最盛时期，所谓盛极而衰，阳气已有所萌动，老虎开始有求偶行为；“荔挺”为兰草的一种，感到阳气的萌动而抽出新芽。

明人王象晋在其《群芳谱》中对此有着十分详细且通俗的解释：“大雪，十一月节，言积寒凛冽，雪至此而大也。”

有趣的是，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以及地理环境的复杂，使得各地在大雪节气期间，通常出现不同的天气景观，如湘鄂等地的冻雨；西北、东北地区的雾凇；江南地区的晨雾；当然免不了还有大范围的暴雪。因此，往往大雪节气一到，处于农闲时节的各家各户便开始忙着腌制过冬的美味，预备着进补，正如民间俗语所说的“小雪腌菜，大雪腌肉”。而这些满怀心意所腌制的食物不光自家享用，大多也成为馈赠亲友的佳品。

中国有着灿烂辉煌并延续至今的农耕文明，对于物候时令的重视从现存著名的“五大农书”中可见一斑。四时的变幻与文学艺术的创作往往是融为一体的，随着大雪节气而来的降温与下雪，不仅催生了许多以“雪”为主题的诗文，也大大丰富了艺术创作中关于雪景的描绘。

唐代诗人王维描绘《袁安卧雪图》，及其雪里芭蕉所体现出的艺术创作的自由性，就曾广为人所称颂。此图虽已不存，但在南唐画家徐熙的《雪竹图》中，我们或许可以体会到相似的意趣。

不畏严寒的不仅有竹子，亦有喜爱雪天的孩童们。今人戴树良与刘金贵的同名作品《大雪》，就描绘了儿童们在雪天堆雪人以及打雪仗的欢快情景。冬日飘雪的室外，成为小朋友们嬉戏玩闹的天然游乐场。而大雪的寒冷，更凸显了阳光的珍贵，在傅仲超的《冬日里的阳光》中，融融的日光不仅温暖着雪中雪白的大地，也透过画面，触动观者的心灵。

在现存的古代雪景图画中，广为人知的还有宋徽宗赵佶名下的《雪江归棹图》。整幅画作用极为细秀的笔触描绘了开阔疏朗的北方江岸雪景，气韵雅润而苍古。在画卷的正中央，一位渔者独自驾着扁舟，面朝着苍莽的雪山。对于这种茫茫雪意的描绘，在今人钟蜀珩的《城市的雪》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。此幅作品虽然施以油彩，却又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色彩对画面的影响，以大面积的白和灰以及暗色调，营造出一种不断向画面外延伸的空旷美感。

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，艺术家的创作，往往发乎性灵，他们用身体感知大雪节气带来的严寒与雨雪，又将之付诸笔端，从而创作出这些隽永的画作。而对于即将到来的大雪节气，我们在感叹自然节律的奥妙时，也更多了一份与古人同赏、今人同庆的快乐。（编辑综合整理）